

宋代笏记的文体考察^{*}

邬志伟

【摘要】笏记是晚唐五代出现，宋代较多见的一种奏议文体，被视为表之变体。现存宋人文集中收录的笏记约80余首，笏记的使用与宋代文书行政功能的加强有关。笏记是臣僚在朝见、朝谢、宴会、庆典等场合面奏皇帝时使用的，臣僚上殿朝见皇帝时，面奏所说之辞，往往事先准备，录于笏上，以免疏失，形成笏记文。笏记与表、奏劄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笏记与表区别在于，表用于文书上奏，笏记用于面奏，因而表文文辞较繁，笏记较简短。笏记与奏劄的区别在于，奏劄在面奏时用于讨论政事，具有实务性，而笏记在面奏时用于庆贺、致谢，当庭宣读，具有礼仪性。因而奏劄为散文，而笏记为四六文，篇幅简短，结构具有程式性，文辞典雅富赡。

【关键词】宋代 笏记 文体 起源 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2-0171-06

笏记是唐宋时期的新文体。关于笏记，前人关注较少，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对“笏记”这一文体有较为简明的解释：“宋人又有笏记，书词于笏，以便宣奏，盖当时面表之词也，故取以附焉。然表文书于牒，则其词稍繁；笏记宣于庭，则其词务简：此又二体之别也。”^①徐师曾认为笏记是宋代之新式，臣僚将面奏时所说内容书写于笏上，以便宣奏。笏记与表是两种相似的文体，其区别在于表书之牒，文词较繁，而笏记需要宣读于庭，其词务简。徐师曾的说法简明扼要，特别是将笏记视为表之变体，目光独到。然而，笏记是如何产生的？何时产生？笏记在文集中保存情况如何？笏记文体除了“其词务简”的特征外，还有什么特征，徐师曾为何将其与表文相联系？在宋代，奏劄也是面奏的辅助产物，臣僚面奏时持有劄子以备疏失，久而久之，劄子便成为宋代最为重要而经典的奏议文体。而笏记也是面奏宣读，那么笏记与劄子又有何区别？下文笔者结合历史文献与笏记作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笏记的起源与使用场合

论及笏记者，大都将笏记视为宋代之新文体。如徐师曾说，“宋人又有笏记”，王之绩《铁立文起》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邬志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讲师、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 珠海，519087)。

①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2页。

也说：“笏记之文始于宋，如苏轼有《谢宣入院笏记》，可证。”^①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笏记并不始于宋代。宋代总集《成都文类》中即收录有后唐李严《笏记》一篇。《旧唐书》也有唐代使用笏记的记载。《旧唐书·刘邺传》记载刘邺内殿辞谢一事：“僖宗即位，萧仿、崔彦昭秉政，素恶邺，乃罢邺知政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是日邺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邺内殿谢，不及笏记，邺自叙十余句语云：‘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②刘邺在授官麻制宣读完毕后，通事舍人引其进入内殿辞谢皇帝。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刘邺没有笏记，所以只能临时自叙十余句谢辞，竟打动了皇帝。从《旧唐书》所载“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谢辞来看，是四六句式，非常工整，这与宋人集中之笏记通篇使用四六文是一致的。刘邺内殿辞谢，没有事先准备笏记，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以推知，晚唐时期，官员辞谢皇帝一般有笏记，而笏记所记，主要为面见皇帝的说辞。正如徐师曾所言“书词于笏，以便宣奏，盖当时面奏之词也”。

笏为官员上朝所持手板，而书辞于笏，则有着悠久的历史。笏的使用，据资料记载，自周武王时即已有，《淮南子·齐俗训》云：“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屨以临朝。”^③武王临朝时搢笏，搢笏即将笏插于腰带上。而在笏上书写文辞，《礼记·玉藻》有记载：“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郑玄注：“思，所思念，将以告君者也。对，所以对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书之于笏，为不忘也。”^④据郑玄的注释，则笏上书写的文字包括告君、对君之辞以及所受君命之辞。所谓象笏，指笏的材制，《礼记正义》云：“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牙，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⑤笏的材制因级别不同而不同，天子以美玉制成，诸侯以象牙，大夫用竹，其边缘以鱼须为饰，士则纯用竹。据《礼记·玉藻》：“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⑥笏的尺寸为长二尺六寸，宽三寸，则完全可以在笏上书写文字。刘熙在《释名》中说：“笏，所启白，则书其上备遗忘也。”^⑦

于笏上书文辞，是自汉代以来的传统，经南北朝至隋朝依然，《宋书》《晋书》《隋书》等史书“礼志”中，皆有笏上簪笔的仪制记载。如沈约《宋书》：“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则古笏矣。尚书令、仆射、尚书手板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汉代以盛奏事，负荷以行，未详也。”^⑧由此可知，笏上簪白笔，是以笏记事的象征，朝服上还缀有专门的囊袋以盛之。《铁立文起》对于臣僚书辞于笏的原因有所分析：“又人臣书笏以便奏，其故有二：一为有紧要事，恐临时或遗；一为有难记事，恐一时说不出。闻往有召十三布政，问以民情风俗，皆缕缕能道其详。及问钱谷数目，则默不能对，遂至罢职。惟一人细书笏上，一一言之，独称旨。亦可见笏之为益大矣。”^⑨据王之绩分析，笏上所记录的一是要紧事，以备提醒，一是难记事，以备疏失。唐代元稹在《上门下裴相公书》一文中提到斐度曾“以文皇敕起居郎书‘居安思危’四字于笏上，为至戒矣”，^⑩可见，唐代曾有在笏上书字为戒的。

由上史料可知，于笏上书辞，由来已久，且历代皆沿袭。在晚唐五代时即有上奏时宣读笏记的记载，

① 王之绩：《铁立文起》，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84页。

② 刘昉等：《旧唐书》卷17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18-4619页。

③ 刘安撰，刘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15页。

④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0-1031页。

⑤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0，第1052页。

⑥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0，第1052页。

⑦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卷19，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2页。

⑧ 沈约：《宋书》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18页。

⑨ 王之绩：《铁立文起》，《历代文话》，第3784-3785页。

⑩ 元稹：《元稹集》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2页。

前引晚唐刘邺内殿辞谢时笏记已见使用。据《册府元龟》记载，五代时百官内殿起居上奏，所奏事往往录在笏记，宣读于庭：“后唐天成元年七月，御史台奏：……自后言事者又奏请五日内殿起居之日，请令百官次第转对奏事，又从之。自是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以所言事形于笏奏，录在笏记，明扬于殿庭。而素无文学及不闲理体者，其文句鄙陋，词繁理寡，敷奏之际，人皆窃笑。然以次第当言，无所辞避。而冗散之徒或行赂假手，傴俛供职，愁苦无繇。”^①所谓内殿起居，是后唐的一种朝见制度，《宋史·礼志》记载：“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宋因其制。”^②五日内殿起居，即群臣每隔五日跟随宰相入内殿朝见皇帝，这项制度为宋朝所沿袭。在内殿五日起居时，规定百官要轮流奏事，这称为“转对”。所言事录在笏奏、笏记，必须宣读于庭。因而，有些文学修养不强以及思理不周密者，往往文句鄙陋，词繁理寡。因为百官依次都要奏对，所以很多人提前请人将奏对的文辞写于笏上，以便宣读。这应当就是笏记这一文体诞生的重要原因。当然，转对后来罢免，改为有言事者出行自陈，但是笏记的使用却没有停止。宋代朝臣上殿轮对、转对时不但持笏还持有劄子。

当庭宣读往往讲究文辞铿锵上口，又因为在晚唐时期骈文主于文坛，四六对句成为了笏记写作的重要特征，因而笏记中的警句也常为人所传颂。《旧五代史》就曾记载后唐李严笏记作品中为人传诵的警句：“李严，幽州人，……同光中，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与王衍相见，陈使者之礼，因于笏记中具述庄宗兴复之功，其警句云：‘才过汶水，缚王彦章于马前；旋及夷门，斩朱友贞于楼上。’严复声韵清亮，蜀人听之愕然。”^③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年间，李严奉使于前蜀，在面见前蜀后主王衍时，在笏记中一一讲述庄宗的兴复之功。从“严复声韵清亮，蜀人听之愕然”的记载来看，他的笏记必定是宣读于庭的，而其警句“才过汶水，缚王彦章于马前；旋及夷门，斩朱友贞于楼上”，正是典型的四六对句，与《旧唐书》刘邺笏记的谢辞“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写法一致。李严的笏记在总集《成都文类》中有收录。

二、宋人集中笏记的收录

唐人虽有笏记，并有作品流传，而将笏记收入文集，则始自宋人。笔者据《四库全书》所收录别集为对象统计，有 24 部宋人别集收录有笏记，计 83 篇，其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宋人别集收录笏记统计表

作者	别集名，卷次	数量	作者	别集名，卷次	数量
田锡	《咸平集》卷 25	12	苏轼	《东坡全集》卷 67、68、69	8
夏竦	《文庄集》卷 12	1	苏辙	《栟城集》后集卷 17	5
胡宿	《文恭集》卷 11	5	沈括	《长兴集》卷 13	1
苏颂	《苏魏公集》卷 36	1	邹浩	《道乡集》卷 19	1
王珪	《华阳集》卷 8	10	慕容彦逢	《摘文堂集》卷 12	1
司马光	《传家集》卷 57	1	王安中	《初寮集》卷 3	1
沈遘	《西溪集》卷 7	2	沈与求	《龟溪集》卷 5	1
王安礼	《王魏公集》卷 5	1	蔡崇礼	《北海集》卷 27	1
范祖禹	《范太史集》卷 6	5	史浩	《鄮峰真隐漫录》卷 21	10
韩维	《南阳集》卷 21、27	4	周必大	《文忠集》卷 162	3
张方平	《乐全集》卷 30	5	吕祖谦	《东莱集》卷 2	1
王安石	《临川集》卷 61	2	陈亮	《龙川集》卷 16	1

宋人别集中的笏记收录数量并不多，大部分文集只录有 1 篇，其中田锡《咸平集》为最多，收录 12 篇，其次为王珪《华阳集》收 10 篇，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收 10 篇。

从笏记文题材内容来看，笏记主要用于庆贺、致谢，大部分笏记为谢辞，少量笏记为贺辞。谢辞涉

①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 517，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5866 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 116，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751 页。

③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 70，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929 页。

及谢除官、谢赐宴、谢节庆贺慰、谢赐物。谢除官是笏记的主要题材，宋人集中大部分笏记都是为谢除授而作。如田锡、范祖禹、苏轼、苏辙、王安石、张方平、胡宿、沈括等人集中都有谢除授笏记。以范祖禹《笏记》为例：“臣伏蒙圣恩，特授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者。侍言经幄，特升严近之班；汗简史闱，俾缀缉熙之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道法尧舜，孝承祖宗，永言若昔之猷，仰对在天之烈。夫何重任，猥属非才。当勉竭于衰疲，庶少酬于造化。”^① 谢赐宴也是笏记的主要题材，王珪、胡宿、慕容彦逢、王安礼、沈遘等人集中皆有谢赐宴笏记。笏记中也涉及谢赐物，如史浩集中所录笏记均为谢赐物，此外田锡、司马光、苏辙等也有谢赐章服、谢生日赐物的笏记。以胡宿《秋宴笏记》为例：“嘉觴备物，正得秋而万宝成；法宸垂衣，居其所而众星拱。粲然盛观，生于太平。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鸿慈自天，湛恩济世，洽兹德礼，燕及臣工。臣等备位何能，蒙泽已渥。愿介万年之景福，共倾三祝于华封。”^② 贺辞涉及贺节庆、贺礼成、贺战捷等，如韩维集中《年节贺皇太后笏记》，吕祖谦集中《为宰臣作端诚殿贺南郊礼成笏记》，周必大集中《明堂礼毕称贺笏记》《郊祀端诚殿贺礼毕笏记》。

从笏记所致对象看，除上皇帝之外，也有写给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太子等人的。苏轼的笏记基本上都为二首一组，一首写给皇帝，一首写给太皇太后，苏辙集中也有这样的现象。韩维集中有年节贺皇太后、皇后笏记，田锡集中有谢皇太子笏记。

笏记是当庭宣读的，谢除授的笏记保存最多，这是因为宋代上殿朝见皇帝有见、谢、辞之礼。《宋史·礼志》记载早朝的班次，其中就有专门为见、谢、辞皇帝而安排的班次：“早朝……宰相奏事，枢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对毕，枢密使复入奏事。次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群臣以次登殿。其见、谢、辞官，以次入于庭。凡见者先之，谢次之，辞又次之。”^③ 见、谢、辞之礼沿袭自唐、五代，在宋代又历沿革变动。^④ 所谓见、谢、辞，指朝见、告谢、朝辞。概括来说，宋代外任官员任满归京需上朝入见皇帝，称朝见；而赴外任地方官及出使的官员在上任前需入朝叩辞皇帝，称朝辞，也称辞谢；宋代官员在除授、加恩等情况下需“捧官告敕牒叙谢”，称告谢。《宋会要辑稿》仪制九记载：“宋朝凡宰臣、亲王、使相、枢密使、节度使降麻制日，并诣崇政或延和殿辞免。若不得请，即告谢。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以下，宣徽使、殿前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节度使，新授或加恩，并即日捧官告敕牒叙谢。”^⑤ 《宋会要辑稿》仪制九“告谢”、“辞谢”条，分别有对不同级别官员告谢、辞谢仪制的详细记载，此不赘述。《宋会要辑稿》礼六二“赏赐”条又载：“凡大臣生日及文武官内职中谢、朝见、受外任及出使朝辞，并于阁门支赐分物。”^⑥ 在告谢、朝见、朝辞的仪制中，皇帝会根据其官阶高下，给予不同等级的衣物、金带、鞍马等赏赐物品。宋代官员的见、谢、辞之仪制，官员需要提前一天在阁门投下“诣正衙榜子”，并向皇帝上表、状等奏章，如有礼物颁赐，需要上谢赐物状或表，而笏记则是当朝面见皇帝辞谢时所说的谢辞。由于见、谢、辞的仪式非常庄重严肃，尤其是外任官员的朝见与辞谢，是君主询问官员施政方略，并了解外任官员的品行、能力的重要场合，笏记的使用能帮助官员事先准备相关言辞，让奏对更为有效完美，这也就是宋代谢除授笏记广为使用的重要原因。

谢除授笏记往往与表文同时使用，因此，文人集中笏记往往都附录于相关表文之后。如苏轼集中6首笏记，分为三套，每2首为一套，其中一为致皇帝谢辞，一为致太皇太后谢辞。这些笏记分别附于相关表、状之后。如《苏轼文集》卷23中《谢翰林学士表二首》之后为《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首》，再之后即为《笏记》二首。苏轼授翰林学士后，分别上表给皇上、太皇太后致谢。因为有对衣、金带、马

①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第131-132页。

② 胡宿：《文恭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710页。

③ 脱脱等：《宋史》卷11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54页。

④ 苗书梅：《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⑤ 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88页。

⑥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703页。

等物的颁赐，苏轼亦需上表或状致谢。笏记则是在朝谢中所说的谢辞。除苏轼之外，其他宋人别集大都如此。如范祖禹《范太史集》卷6中《笏记》录于《谢除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表》《谢对衣金带鞍马表》之后，沈括《长兴集》卷13中《除翰林学士笏记》录于《除翰林学士谢宣召表》之后。

三、笏记的文体形态

表在唐宋时期主要用于庆贺、辞免、陈谢、进书、贡物，且多用四六文。笏记的题材内容与表基本一致，故前人常将笏记视为表之附或表之变。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笏记附于表，称为“面表之词”。但笏记与表的文体形态还是有所区别的。

笏记与表相区别在于，表用于文书上奏，笏记用于面奏，是朝见、朝谢、宴会、庆典等重要的礼仪性场合臣僚面对皇帝所陈述话语的底本。由于这些场合本身具有一定仪式性，发表于这些重要场合的言论，其措辞也需要特别注意思路文理、文辞修饰，臣僚将这些文辞事先写于笏上以防疏失。这种使用场合与使用方式使得笏记有鲜明的文体特征。

首先，笏记皆非常简短。这与笏记在当庭宣读有关，当庭宣读一方面受时间限制，另一方面受口说耳听的传播方式限制，都不宜冗长，应尽量精练。宋人集中所有笏记，皆较为短简，大都在100字左右，约为四至八对骈句，最长也不过200多字，最短的只有两句，20多字。唯一的例外是收录于《成都文类》中的后唐李严笏记，讲述后唐庄宗兴复之功，全文398字。

其次，笏记为工整的四六文，文辞讲究用典、对仗、声韵。在宋代，凡是具有仪式性的文体一般以骈体四六为主，如属于王言的制、诏，以及用于婚礼的婚书，笏记也具有这种属性。前文所提到的笏记警句“才过汶水，缚王彦章于马前；旋及夷门，斩朱友贞于楼上”（李严笏记语），“竣事泰坛，扬八鍩而返轸；受厘皇邸，旅万玉以充庭”（吕祖谦笏记语），皆对仗工整。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庭宣读，四六文节奏感强，能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文辞富赡，能彰显个人的文学素养、品味，符合朝见、中谢、宴会、庆典等重要礼仪性场合的需要。

以吕祖谦《为宰臣作端诚殿贺南郊礼成笏记》为例：“竣事泰坛，扬八鍩而返轸；受厘皇邸，旅万玉以充庭。伏惟皇帝陛下对越穆清，肃将纯嘏，本以宸心之恪，登兹熙事之成。陈安止谟，念几康而昭受，进敬之戒，监陟降于显思。”^①这篇笏记是于天子祭祀南郊即祭天礼礼成之后，在端诚殿面见皇上时所面陈。因用于重要的祭祀典礼礼成，所以通篇文辞古雅典重，讲究用典，大量使用了来自《尚书》、《诗经》的典故。比如，对皇帝祭祀行为的称颂，用“对越穆清，肃将纯嘏”，“对越”、“穆清”等词语出自《诗经·周颂·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②《清庙》是周王于宗庙祭祀文王的乐歌，“对”指报答，“越”指宣扬，即答谢颂扬上天的福祉，吕祖谦用来代指皇帝的祭天。“肃将”、“纯嘏”分别来自《尚书·泰誓上》“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③和《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锡尔纯嘏，子孙其湛”，^④“肃将”意为敬奉，“纯嘏”意为大福，即敬奉大福。最后一联，“陈安止谟，念几康而昭受，进敬之戒，监陟降于显思”，也使用了来自《尚书·皋陶谟》《诗经·周颂·敬之》的典故。“安止谟”，即《尚书·皋陶谟》中大禹在与皋陶探讨政事时所说的“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郑康成解释“安止”为“安汝之所止，无妄动，动则扰民”，^⑤这里寄寓了作者对皇帝陛下的期望，能思危以图其安，不论安危，都敬畏上天的昭命。“敬之戒”，很显然指《诗经·周颂·敬之》的告诫“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⑥“进敬之戒”，意在指出皇帝与群臣应敬天、畏天

① 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卷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②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34页。

③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页。

④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697页。

⑤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5页。

⑥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977页。

以获得祖宗神灵护佑。

其三，结构简单，呈程式化。笏记文的写作基本上遵循相似的套路。其写作格式以苏轼《笏记》为例：“臣蒙恩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者。出膺闾寄，入长禁林，皆儒者之极荣，岂弩材之所称。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贤，总揽群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尘之报，未知糜陨之期。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①第一句交待事由，即蒙恩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第二句点明长期以来所受恩宠荣耀，出则委以军事重任，入则在翰苑掌制诰，并表示自谦，才不称位。第三句，感谢皇帝陛下效法古圣君，能延揽英才，兼收小器。第四句，表示授官之后的感恩与责任。第五句则为结束笏记表感恩格式套语。其他文人的笏记，程式也大体如此。

从题材内容来说，笏记与表文相似，主要用于陈谢、庆贺，可以视作表文的变体，但比表文简短精炼。从使用场合来说，笏记与劄子相似。宋代奏劄是面奏的辅助产物，臣僚面奏持有劄子以备疏失，而笏记也是用于面奏宣读。其区别在于，劄子用于奏事，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事理的分析，论辨、进言是其主要属性，其功能是实务性的，虽然也讲究叙事、义理、文辞、文气，但最终目的是关于政事的处理，因而其文体始终为散文。而笏记是礼仪性的，致谢、庆贺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关键在于如何说得得体、漂亮，所以笏记的文体是骈文，文辞讲究典雅富赡。

笏记在晚唐五代时期出现，宋代开始较为多见。究其原因，这也与宋代文书行政功能的加强有关。在宋代，君臣之间的信息交流，除了面奏达成之外，往往要借助文书来最终实现。宋代皇帝与臣僚的政事探讨由以坐而论道为主，转变为以批阅奏章为主，尽管宋代皇帝有早朝、五日起居等朝会，又有以轮对、转对、朝见、朝辞等方式，扩大百官面见皇帝的机会，实现皇帝与臣僚的面对面交流，但是这种交流依然需要倚靠劄子、笏记等文书来最终实现。这也使得宋代奏议文大量增加，奏劄、笏记、膀子等奏议类新文体得以产生。如同劄子慢慢从口奏的辅助文书而独立成为与奏状一样的奏议文书，从而实现文体的独立，笏记的出现亦是如此，臣僚致谢、庆贺本来通过上表即可完成，但在上殿朝见皇帝时，面奏所说之辞，往往事先准备，录于笏上，以免疏失，从而产生了笏记这一文体。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83-684页。

（上接第149页）

作品均具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调。这一点与中国作家莫言的小说创作所走过的道路基本类似。在“记忆”的总体叙事策略统一控制下，石黑一雄将“记忆”中的虚幻世界与“现实”中的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使其小说“充满情感力量”；其文学语言逻辑的荒谬性，既是对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荒谬小说传统的继承，也是语言学转向过程中话语游戏对其产生影响的结果。总体而言，这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仅为石黑一雄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而已，其小说的主题思想仍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是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实验之后所形成的新的现实主义，可被称之为“后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石黑一雄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始终遵循“文学是人学”的文学准则，以其强烈的人文情感，揭示出“虚幻之下”当代人所处的“深渊”，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化过程中，其作品既为当代大众文学与文学经典化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合理的诠释，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其作品既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倾向”保持了一致，同时也对“文学已死”的呼声做出了否定，并以事实印证了持之以恒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

责任编辑：王法敏